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1.03.015

迟子建“创作重复”现象与当代中国文学症候

程小强

(西安外国语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8)

摘 要: 迟子建多年来创作上的重复不是文坛孤案, 而是一批当代知名作家的创作共性; 一些批评家碍于情面等因素的吹捧式评价, 更是遮蔽、加重了这一文坛痼疾。究其根源, 这种创作症候源于作家为文观的偏差、写作能力的不足、对现代主义的过度迷恋以及批评界不负责任的超越性论调等多种因素。唯有尊重文学的时代性诉求, 重审现代主义与现代性的遗产, 杜绝历史虚无主义与不必要的神秘主义, 重返经典, 重提写作的非功利性, 才能彻底根除这种功利浮躁时代的文学病相。

关键词: 迟子建; 创作重复; 吹捧式评价; 写作能力; 时代性诉求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1)03-0109-06

引用格式: 程小强. 迟子建“创作重复”现象与当代中国文学症候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6(3): 109-114.

Chi Zijian's "Crenation Repetition" and Symptom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CHENG Xiaoqi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128, China)

Abstract: The repetition of Chi Zijian's creation over the years is not a lonely case in the literary world, but the creation commonality of a group of contemporary famous writers. The flattering evaluations made by some critics have even more obscured and aggravated this chronic literary disease. Tracing to its causes, this kind of writing symptom originates from the writer's deviation of literary view, the deficiency of writing ability, the excessive infatuation with modernism and the irresponsible transcendence of criticism. Only by respecting the demands of the times of literature, reviewing the heritage of modernism and modernity, putting an end to historical nihilism and unnecessary mysticism, returning to the classics and emphasizing the non-utilitarian nature of writing, can this utilitarian impetuous era of literary disease be completely eradicated.

Keywords: Chi Zijian; creation repetition; flattering evaluation; writing ability; appeal of the times

笔者于近些年开展的张爱玲晚期写作研究中, 发现了张爱玲的写作艰窘: 寓居美国时期的张爱玲不得不坚持写作但又无故事可讲, 只能重复描叙自己的生命经历。这份艰窘源于张爱玲 1955 年

收稿日期: 2021-03-08

基金项目: 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专项基金“路遥文学经典化问题研究”(17JK0026); 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外学者”(中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

作者简介: 程小强(1982—), 男, 甘肃镇原人, 西安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赴美之后创作资源的枯竭。这说起来虽难以置信,但确为天才作家张爱玲实实在在的困境。作为参照,笔者在多年的文学阅读中曾特别欣赏迟子建的美学风格,仔细翻阅过她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起舞》《踏着月光的行板》《一匹马两个人》《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福翩翩》《白雪乌鸦》《伪满洲国》《群山之巅》《候鸟的勇敢》《烟火漫卷》等一系列作品。连贯的阅读使那种似曾相识的意趣和感受产生了堆积感,及至稍事思考后,笔者发现,迟子建创作的自我重复程度已触目惊心,但众多的当代文学批评者却对此视若无睹。张爱玲遭遇创作资源缺乏困境的1944年之际,即有傅雷和吴小如著文对其进行善意劝谏。反观当下,迟子建等多位当代知名作家的创作出现大面积重复写作时,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界却几乎对此视而不见,鲜有论者发以善意的规劝和认真严谨的批评。相反,还有不少批评者对这些作家的创作进行认知趋同的吹捧式批评。其实,这已不是某一个作家和批评家的病相,而是当代中国文坛的普遍痼疾。

一 作为当代中国文学症候的迟子建“创作重复”现象

一批生于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作家于新时期以来迅速成名,其中部分作家至今仍笔耕不辍。与此同步,多位学者和批评家在对他们的创作进行跟踪研究时,其评论中夹杂着分量不少的不顾事实的吹捧。此类吹捧一般都从这些作家既有的文学写作出发,夸赞其新作的突破与贡献。如部分迟子建研究的关键词:“苦难叙事”(朱思敏)、“枪口下的善良与温情”(王波)、“‘超现实’、‘超历史’的品质”(张学昕)、“坚执的勇敢与无尽的情怀”(盖光)、“温情视域中的微观生活与宏大精神”(孙彦峰)、“现实的桎梏与神秘的弥漫”(欧芳艳)、“真纯而细腻的体验、忧伤而不绝望的抒写”(冀艳)、“苍凉背后的一缕温暖”(徐银银)、“地域文化风景”“用温情书写爱”(迟晓旭)、“‘善与慈、爱与美’的执著追寻”(霍鹏丽);“独特动物意象背后的悲凉与人性”(肖珍珍)、“死亡下的生命之歌”(孙小竹)、“温情浸润的苦难悲歌”(肖欢)、“生命的体悟与人性救赎”(唐艳霞)、“追寻生命

的意义”(赵丹)、“历史长河中的生命赞歌”(危婷)、“反思自身的勇气和自我救赎的可能”(张学昕)、“忍辱负重 顽强呼吸”(陈杰)、“‘黑夜’中寻求人性的星光”“悲悯情怀下的忧伤之境”(崔佳琪)、“神性书写”(刘艳)、“温情叙事”(金丹)、“边地民间的奇特风景”(周越强)、“悲悯情怀”(宋秋云)、“心灵救赎”(文红霞)、“‘神秘’:理解迟子建小说及其海外传播的一个关键词”(褚云侠)、“幽深玄远的神性”“神魅色彩”(焦明明)、“神性生命世界的构筑”(易瑛)、“神话的建构与结构”(王婉婉)、“神性元素”(胡冶珍)、“神话意象”(杨婷),等等。这些评价因认知趋同而具备模式化特点,实际上也反证了迟子建创作上的重复。在当代中国文坛,这并不是迟子建一位作家的创作/研究现状,本文将此类创作现象命名为“迟子建现象”:作家们的创作起点大都不凡,成名与登上文坛几乎同步,且产量颇丰,但在面临普遍的写无可写的窘境之后仍坚持重复式写作。这代作家登上文坛时适逢中国文学黄金期的“八十年代”,作家成名比此前此后的任何时期都要容易,甚至仅需一部长篇或几个中短篇即可成名,典型者如张炜之《古船》、贾平凹之《浮躁》、韩少功之《爸爸爸》、方方之《风景》、余华之《十八岁出门远行》《在细雨中呼喊》《现实一种》、格非之《褐色鸟群》、叶兆言之《夜泊秦淮》《艳歌行》等等。以此为起点,他们在之后的30余年间整体上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态势,只是持续的创作冲动与有限的创作资源的矛盾同样发生在这代作家身上,成为这一批作家的重大焦虑。除部分作家如莫言、韩少功、王安忆等注重调整,不断在叙事题材与技巧形式上进行拓展外,尚有一批作家的创作长期以来无法克服面相丰富而内质单一的痼疾。他们的创作整体上具备如下特征:就单部作品而言,每部(篇)均属优秀之作,但如果完整地梳理其整个创作脉络,就会发现,所谓新作几无开拓而多显重复。可以说,作家一生创作出《额尔古纳河右岸》《伪满洲国》《白雪乌鸦》《群山之巅》《烟火漫卷》等作品中的任何一部,肯定都会位列优秀作家之列,其人其文亦足可传世,但一旦这些作品变成一个作家在一个时期内的全部创作,就是巨大的重复。对此,史玉丰曾经如是评论:

对迟子建小说的单篇阅读要比整体阅读愉悦得多，她的小说出现的模式化倾向使文本无法经受整体审视和比较阅读的经验，她的写作词汇、叙述语气以及讲述策略都似乎有着千篇一律的倾向，通常会使人产生看一篇而知全体，窥一叶而知天下秋的阅读感受^[1]。

此当为万千读者实实在在的阅读体验。迟子建30余年来的创作集结在灾难考验人性、呈示人性光芒、展示生命韧性、营造悲剧美学、组织神秘人事、偏好诗性语言与浪漫笔法、注重白描东北边地风景等层面，其每部新作都在上述话题内形成重复而非突破：“纵观当代作家的写作，迟子建小说的雷同现象可说是非常惊人的，以至于让人怀疑她是在用自我抄袭的方式来复制写作、实现高产。”^[2]这不是迟子建一个人的创作痼疾，而是一批作家的创作症候。如叶兆言的叙事大都瞩目于欲望在历史行进中的强力释放、男女由欲乱情迷引起的人生悲剧、以自由人性为基础的欲望伸张来超越革命话语、历史褪化为人性悲剧展开的背景等等。贾平凹的创作在神秘人物塑造、城乡二元叙事、前现代叙事、隐秘暴力与欲望叙事、具现代主义的意象隐喻与儒佛道的神秘玄言结构、血腥暴力与嗜脏好恶等层面下足了功夫，其“不断的重复也造成了内容上机械式的自我复制与思想上的停滞不前”^[3]，进而使贾平凹自《秦腔》之后的创作缺乏应有的创新与深度。饶是如此，他们的每部新作面世后总会好评如潮。这些好评背后即是一批评论家与作家长期以来基于情面而有意疏忽作家创作史，甚至不顾硬伤和价值观进行就事不论事的夸饰与不负责任的吹捧，其对这些作家创作的重复现象刻意视而不见。可以说，一方面，当代批评家的面子批评、人情批评破坏了当代文学创作生态与底线；另一面，作家将自身有限的创作资源一次次集中并极限化地使用后形成重复创作，又欣然接受不负责任的批评家之鼓舞，几无勇气正视自我写作深陷重复窘境而自欺欺人。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生态持续恶化、名利场效应凸显又加重了这一痼疾。新时期以来，创作界形成一个怪圈：作家成名后，毫不懈怠地搞创作，连带整个文坛都对他们抱有极高期待。动因仅源于作家们可获得来自官方与市场两个层面的重大收益。尤其是在意识形态允许范围内模式化地大

讲特讲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又能适时调整自身创作以满足不断加速的商业化、后现代化的市场需求时，这类作家必然名利兼收。

二 功利浮躁时代的文学病相

作家的创作重复其实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自有文学以来的共通难题，只不过新时期以来的作家们遭遇的创作重复困境更多呈现出新的病相：

其一，作家的为文观存在偏差。1980年代以来，在文学去政治意识形态的背景下，文学性、人性论、自由主义的复归与重申成为至今仍流行的最重要美学观念，相应创作几乎都是在泛人性论基础上的不断变换花样，而对历史与人生负责任的创作多被弃之如敝履。历史地看，这类文学性、自由主义、人性论的文学写作普泛化、绝对化、自我崇高化、神秘化的偏执背后，恰恰是一批作家对中外自由主义文学的皮相理解，亦源于他们对19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深度迷信之外的片面曲解，至于将西方现代主义简化为形式探索的狭隘观念更是蔚然成风。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资源的中国化过程中，当代中国作家更易习得其具体写作方法与技巧，而忽视这类文学寄托家国人生之思与砥砺人性道德之质等现实主义底蕴与品格的发现、接受与转进。如《群山之巅》，表征的是迟子建自创作以来再三执迷的神秘主义的胜利而非现实主义的胜利。其是人的神性的夸张与阿Q精神普泛化的再尝试，而非现实主义经典的创制。又如叶兆言的《刻骨铭心》，是创作者的中年心态主宰下欲望颓废叙事的收获，是将身负深重灾难的南京历史通过文学叙事风月化了，其用不加节制的人性欲望大力稀释了民族的家国灾难；其抒写欲望几乎不顾人伦，视点下沉而多见恶俗。叶兆言这类作品可以说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新样板。

其二，写作能力不足。从中外文学传统看，长篇小说写作大体上有两种类型：一为史诗类创作，一为心灵史创作；后一类型多见于现代以来的文学写作。至于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其既是史诗性巨制，同时也是民族心灵史的抒写。其一面是对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历史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透视，另一面是对大时代下个人心态、

心理与心思进行细致入微的刻画。就现代中国文学而言,确实缺乏此类史诗性与心灵史高度融汇的长篇巨制,史诗性与心灵史的结合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难题。在这个意义上,《财主底儿女们》《四世同堂》等成为了无法复制的经典。以此为参照,当代作家普遍由于写作能力不足,而将耗神费力的史诗性写作窄化为对历史碎片化的断章取义,历史甚至被一批作家巧妙地处理成人物尤其是一众小人物成长与叙事展开的背景。此类写法呈现的并非四两拨千斤之机妙,而是小马拉大车的无力感。可以说,一批新时期以来作家的史诗性写作水准多未超过《青春之歌》《创业史》等“十七年”文学经典。至于心灵史的写法,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的重要开拓,新时期以来多结奇异之果。不少作家专注于个人自由行走、欲望伸张、唯美颓废、虚无妥协之志抒发等,人性论巧借自由主义东风回潮并成为文学叙事的一大法宝,作家不负责任之言与文频出。当一般作家对人性的挖掘有所欠缺之际,神秘主义写作大肆流行以补人性论之不足成为大家执迷的创作捷径,以至于他们的创作中佛道之迷信玄惑与巫觋占卜文化流行,各类玄之又玄的佛道及各式隐者高人之玄言妙论泛滥,其叙事多着力印证此类玄言机理无比正确和神乎其神。对此,却有论者不分青红皂白给予肯定:“与其他作家着力于创造意识形态属性明显的集体性或个体性神话不同,贾平凹试图还原神话在人类日常生活史中的本真状态,突出其作为人类知识与思想来源的背景作用,以及以‘互渗’形式促成人与万物实现互联的重要特质。作为一种方法的神话也体现于其通过具有神性特质的人物设置,构建日常生活的神话空间,继而形成一个整体性的稳定神话系统。”^[4]事实上,贾平凹及其创作从来不认可也不属于神话系统,其信奉的是陕南-关中诸如风水迷信阴阳学说的道家文化。这样的扭曲与人为拔高不是批评个案,而是一批论者长期以来的话语模式:“他在小说中不断用原始意象、巫鬼文化来书写乡土中国,最终让涡镇在一片繁荣中归于寂静,回归到乡土中,是他对现代文明代替传统文化的隐忧和不满,对中国文化的现代性产生的质疑。”^[5]这类批评将此类缺乏审美特质的怪力乱神叙事与寻根文学接续起来,将之看作是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实

则是抹黑扭曲中国文学传统。即如《搜神记》《聊斋志异》《西游记》等神魔鬼怪小说,其起码具备基本的现实讽喻功能,而贾平凹等一些作家却热衷于翻转那些现代的糟粕。如此叙事与批评,既虚假又滑稽,表征的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泛滥与文学叙事的没落并行。即使是陈忠实的《白鹿原》,也沾染了此类神秘叙事的风格而显得玄妙莫测,其实质就是将一般迷信宣叙为玄妙之论。以是观之,当代著名作家张承志、史铁生、王小波等“心灵史/精神史”写作、宗璞的《野葫芦引》系列小说及岳重的《南渡北归》等创作,能够做到史诗性与心灵史的完美结合,确乎难能可贵。

其三,文学超越性论调成为不负责任写作的护身符与遮羞布。伟大的文学叙事必然是对作者所处时代的高度见证,文学经典的最重要贡献在于其对时代风潮或隐秘心思的具宽度、高度与厚度的见证式书写,或是对社会历史、民族家国、人性道德的负责任抒写。王国维认为《桃花扇》和《红楼梦》之差在于“政治、国民、历史”与“哲学、宇宙、文学”的叙事维度之别。王国维之语,只是对《桃花扇》和《红楼梦》宏观比较,并没有作更具体的阐释,当有不严谨处,因为《桃花扇》不乏“哲学、宇宙、文学”之向度,《红楼梦》更不缺“政治、国民、历史”之隐忧。当代部分学者为了对鲁迅、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作出貌似更高深、更具创新性的解读,就在文学的时代性提法外,全面复活了文学的超越性话语,并将文学的超越性推演为评价作家作品是否伟大的最重要原则:只要能阐释出超越性与超时代性,这类作家作品就是伟大的;如果没有阐释出超越性,那这类作家作品就是次伟大或者不伟大的。以至于到这样的程度,一个批评家如果不谈文学创作的超越性,就好像自己的学术论文都羞于示人。一般而言,社会历史与人性道德都是客观存在的,超越性的提法用于肯定优秀作家对时代进行了超越同代其他作家的观察、记录与叙事,而非一个作家之感思与记叙能获得超时空的延伸,超越性的提法首先应基于时代性而非印证后来的无中生有之启示。那些将文学的超越性理解为超越时代之论的评价,就是对作家和时代关系的扭曲,是对文学功能的错解,是批评责任的缺位。我们根本无法想象鲁迅之于辛亥革命及至1920年代以来

中国社会历史与人性道德的批判式书写价值要在百年之后彰显。或者有聪明的批评家阐释鲁迅的意义时，认为其创作不仅在于呈现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经验，更在于其百年之后仍具备振聋发聩意义。此类移花接木式的评价无非是采用人为拔高的手段，刻意制造一个超时空的鲁迅。这种论述貌似伟大高深，实则荒唐。此类超越性提法，借当下批评家和学者不负责任地运用似乎变成了真理，进而成为衡量创作成就的标准，并且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对此深信不疑。在此背景下，人性论、自由论、神秘主义、廉价的温情以及各种杜绝历史正义的审美论调就成为文学叙事主流了。

三 消除症候的可能与路径

多年来，“纯文学”命运堪忧，除了当下文学环境遭遇“后革命”时期以来市场经济及相应意识形态的持续冲击外，当代文学自身创作水准下降是最重要的原因，可以说，当下的作家意识与文学环境几乎同步堕落。从中外文学发展的历史看，作家的写作除应具备相当的创新意识外，更需谨守多重底线：

其一，尊重文学的时代性诉求。伟大文学之伟大首先在于其时代性，如杜甫对盛唐衰变的史诗般记录，汤显祖在理学严重桎梏人性的时代对青春与爱及美的歌颂，孔尚任替汉文化与知识分子发出的忏悔之声，鲁迅对辛亥革命及至五四以来中国经验的精深观察与高度传达，沈从文对湘西近代以来爱与美逐渐消失的伤感与惆怅，列夫·托尔斯泰对19世纪末俄国不可遏抑地走向衰落的史诗级呈现，艾略特对20世纪初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虚无与绝望症候的深度传达，普鲁斯特对后现代时期人类心理可能抵达的深度与细度的发现与描写，等等，这些作家的笔触直抵其所处时代社会历史与人性道德的深处，并自觉担当起传递人类良知、惩恶扬善、揭露怪象、反抗不公、批判荒诞的责任。即使一些优秀的历史题材小说《陶渊明写〈挽歌〉》《杜子美还乡》《关汉卿》以及魔幻小说《聊斋志异》《西游记》、世俗小说《金瓶梅》《金粉世家》等等，也都无不指向对作家所处时代疾患的批判。

其二，重审现代主义与现代性的遗产。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进入了现代主义（先锋）的狂

飙突进时期。彼时，作家们大都放弃了小说的讲故事传统，小说成为语言、技巧与形式的跑马场。如先锋作家创新了中国故事的表达形式却也往往过于执迷语言、写意、技巧，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技巧甚至成为其唯一关注点，摩登、荒原、异化、超现实、乌托邦、荒诞、魔幻、抽象的抒情等成为新的美学规范，思考与关怀严重缺位。就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本质而言，对人性体的察、对生命意识的传达、对人类困境的揭示仍居于其叙事核心，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并非像某些作家与批评家理解的那样，只是对作为形式的含混、误读、复义、象征、隐喻、反讽、戏仿等的简单借用。实质上，这样的文学表达，一旦脱离对人类生命的敬畏、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深刻观照以及对作家本该具备的责任良知的砥砺后，就会陷溺于看似五彩纷呈实则简单空洞的技巧营造之幻境。必须说明的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强化并偏好形式主义，实则源于其对工业革命时期以来人类精神走向虚无的洞见与担忧，其艺术化地再现了作为现代症候的人类隔膜、精神虚无与存在困境。而在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形式主义者那里，现代主义被其窄化为文学技巧并一再泛化和寓言化，其本身的创作自然也就舍本逐末，处处谋求纯粹的形式主义。

其三，杜绝历史虚无主义与不必要的神秘主义，更不要将其模式化与普泛化。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有着深远的传统。每逢国家易代、战乱频仍之时，在各种关于战争与死亡体验的记述中，经由参佛悟道之后对生命意趣的寡淡理解者大都走向虚无。历史虚无主义往往以唯心主义的方式对时代巨变进行阐释，发出种种虚妄之论。历史虚无主义论者看不清也不愿意相信未来与时代，更杜绝一切关于群众力量的论述，成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忠实实践者。在这类创作观念支配下的文学创作，自由个体在有限的生命空间中的放纵欲望、迷恋物质、极端自私、冷酷无情、妥协投降、无底线的戏谑狂欢等，就成为全新的、伟大的、人性自由伸张的启示，叙事者甚至将故作神秘、宣扬封建迷信、嘲讽经典、扭曲历史、嗜脏好恶、颠倒黑白、鼓弄玄虚、泛化人性、夸饰技巧等作为新的叙事自觉。缘于此，当代中国部分作家的写作日趋走向扭曲。

其四,重返经典。由于过于相信天赋的作用,有一部分作家疏于汲取中外文学养分。从文坛巨匠共同的创作经验看,向本国经典及全人类优秀经典学习几乎是每一位伟大作家成长的必由之路。由是观之,中国当代文坛亟需“补钙”,而不应是急于撇清自己和文学传统的关系,盲目乐观地片面追求所谓的“当代性”。实践证明,只有重返经典,向经典学习,向大师致敬,才能避免越来越多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距《子夜》水准越来越远的尴尬。

其五,重提写作的非功利性。写作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那些自我重复的作家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他们一旦走上文学道路,便笔耕不辍、勤勉为文;一些作家甚至每两年便有长篇问世,彼此之间还在创作数量上你追我赶、唯恐落后。有论者如此评论新世纪前十年的长篇小说创作现状:“为追求数量和速度,很多作家不断进行自我复制或者相互复制,模式化、雷同化倾向严重,甚至出现了流水线、创作工厂等现象。”^[6]这显然是不正常的文学现象。鲁迅创作《呐喊》时已近不惑之年,茅盾创作《子夜》时已成名多年,沈从文创作《边城》时已练笔10余年,吴组缃一生只创作了约30余万字小说。可叹的是,这种“十年磨一剑”的创作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写作中几乎凤毛麟角了。文学创作本来就不是比数量的,创作应该讲究的是如何培育精品。一个有抱负的作家,应该有胸怀中华文明与文化甚至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大格局,对时代、民族、国家的深刻变革进行细心体察,而不是紧跟潮流、追踪热点、人为地制造惊艳、放纵欲望、重复自我、皮相模仿。文学史上的事实证明,最终能够让读者肃然起敬的是一个作家作品中展现出来的当仁不让的人类意识、哲学意识、担当意识、忧患意识、大格局意识。

上述笔者所说的创作症候并非迟子建一个人的创作症候,而是迟子建和一批同代作家共同积聚的创作缺失。于迟子建而言,笔者的这些批评可能会令她和多位批评家难以接受。很多批评家

在论及迟子建的创作时屡屡出现温情与苦难、人性善恶、神性之光、小人物的生命韧性等辞藻,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众口一词本身就是巨大重复。迟子建本人在相当多的创作谈里也只字不提和不承认自己的写作重复问题,却反复提及自己有限的经历和生命认知,显然,这种创作谈同样也是一种重复。基于大体趋同的生命体验和情感认知,其创作重复几乎命定,迟子建对此或许习焉不察,或许不愿承认,但其创作早已模式化确实是确凿无疑之事实。换言之,这是由她的每一部堪称优秀之作的近似叙事而堆积起来的创作实际。进而言之,迟子建在小人物身上做足了文章,对20世纪中外文学小人物叙事传统进行了重大拓展,但她笔下的小人物的精神胜利法、生命顽强论(面对灾祸而坚韧求存,甚至以欲望伸张呈现生命力)、道德正义论(以道德精神之高尚克服生存境遇之艰窘)、神乎其神论、人间大爱论、暴力美学等也在推陈出新的同时,几乎全部模式化了。当然,笔者并不认为不可以去大张旗鼓地去抒写小人物的种种人生奋争、人性光芒,而是说,如果像迟子建那样将其泛化和普遍化,就背离了创作的创造性本质。

是为启示。

参考文献:

- [1] 史玉丰.艰难的突破:迟子建近作问题透视[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4(2):76-79.
- [2] 唐小林.迟子建小说的“痼疾”[J].文学自由谈,2018(5):35-48.
- [3] 吴沛芮.贾平凹长篇小说的重复现象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9.
- [4] 张 栋.日常生活史的神话认知与表达:以《山本》为例[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9(5):128-136.
- [5] 杜 睿.原始意象与巫鬼图腾:贾平凹《山本》的新“乡土”书写[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47(4):103-108.
- [6] 周景雷.新世纪十年长篇小说“量”点摭拾:新世纪十年长篇小说总论之一[J].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2(1):43-46,75.

责任编辑:黄声波